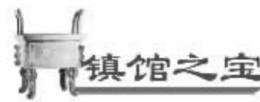


新一波“读书无用论”真实地存在于当下中国乡村,其背后有着一套复杂的新社会结构逻辑——



贾湖骨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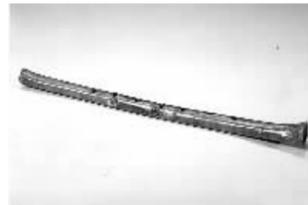
## 远古的笛声

□ 王奕

2007年底,河南博物院从馆藏13万件藏品中的576件国家一级文物中,精心挑选出9件最能代表河南历史文化的国宝,作为镇馆之宝。其中,位居榜首的就是贾湖骨笛。它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甚至今天的人们还能使用此笛吹奏五声阶的曲子《小白菜》。

据工作人员介绍,贾湖骨笛出土于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前期,也就是公元前7000年左右。从外形看,这支贾湖骨笛呈黄棕色,制作精美,全长23.1厘米,笛身上钻有七个圆形音孔,孔径0.35厘米,分布均匀,经测音可发出完备的六声音阶和不完备的七声音阶。在目前发现的30多支贾湖骨笛中,这是保存完整的一支,堪称“中华第一笛”。该墓出土有两件形制相似的骨笛,它们是一雌一雄,印证了中国自古雌雄笛的传统。

贾湖骨笛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一种竖吹骨笛,也是后世竖笛或洞箫类乐器的祖型,此骨笛的发现反映了我国史前音乐文明的高度发达。贾湖骨笛的使用年代早于半坡陶埙和河姆渡骨哨两三千年,是中国音乐文化有九千年文明史的最直接有力的佐证。



发现骨笛的地方,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在距今九千年前淮河上游广袤的平原上,有一片美丽的沼泽,那里生活着一个富足的部落。那时的贾湖人能够人工栽培稻,也掌握了酒的最古老酿造方法,甚至他们所使用的甲骨文刻划符号与比它晚四五千年的殷墟甲骨文有着惊人的相似。“贾湖文化的创造者不仅是优秀的农民、猎人、渔夫和工匠,而且还是优秀的音乐家。贾湖文化的发现,再现了淮河上游八九千年前的辉煌,与同时期西亚两河流域的远古文化相映生辉,是当时东亚地区的一个缩影,为研究当时社会的经济、技术、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贾湖文化专家、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居中教授这样评价。

人类的时间巨轮一刻不停地前推,贾湖文明并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掩埋。1979年秋天,贾湖村小学教师贾建国带领学生到堤外平整土地时,惊奇地发现了散落在地面的石斧、石铲和破碎的陶片等。贾建国猜想这些可能是新石器时期的遗迹,于是将它们送交到县博物馆。贾建国的举动引出了“中国二十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的贾湖遗址。在一座编号为M282的墓葬里,人们发现一具保存完好的尸骨及60多件随葬品。考古专家猜想,墓主人生前可能是巫师或部落酋长。而在墓主人左大腿一侧,就摆放着这支骨笛。

这支在地下沉睡了八九千年的骨笛经过测音,不仅已经具备音阶结构,而且还能够演奏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是一种古代乐器。经动物学家鉴定,骨笛是用鹤类动物的尺骨制成。鸟类的尺骨薄壁中空,如果截去两端骨关节就是一个理想的发音管,很适宜做笛子。

资料证实,到目前为止,贾湖骨笛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现在还能用以演奏的乐器实物,比古埃及出现的笛子要早两千年,被称为中国管乐器的鼻祖。这也是中国音乐考古中继湖北曾侯乙墓编钟、编磬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责任编辑 教蓉梁婧

邮箱 jrbzmzk@163.com

# 农门不再爱读书?

□ 余颖



展统计公报》,农村留守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数量已经连续三年下降:2012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271.07万人。2013年,这个数字下降到2126.75万人,2014年又再次下降到2075.42万人。其中固然有人口数量自然波动、随进城务工人员外迁入学等因素,读书无用的观点也起到了副作用。

## 学什么以致用

不是读书无用论盛行,而是无用的读书太多

对如今读书人在农村的地位下降,杨东平把板子打在教育环节本身。他直言,“是我们现在一些‘无用的读书’,才导致所谓的‘读书无用论’”。

目前在我国,从农村到城市,全国使用的是同一套教学大纲,通行的依然是选拔性的应试教育,课堂传授的知识和技能主要针对升学,跟农村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关系。这时候,衡量读书有没有用的唯一标准就是能不能考上学校,如果能考上学校就有用,考不上学校就没用。但升学并不是所有农村学生的选择。“特别是初中学生已经具备了识字和计算的能力,枯燥的应试训练对他们没有实际用处。如果他们觉得自己考普通高中无望,那随之而来的厌学情绪和放弃学习的状态可能更严重。”杨东平这样解释初中较高的辍学率。

同时,由于专心读书,考不上学校的落榜生可能不具备农业生产的基本技能或者体力,很难再在农村生活下去,但去城市发展又少了一些必要条件,这样一来读书就显得“无用”。至于为什么子女还在上学的家庭和子女已经毕业的家庭,对读书效用的看法会发生巨大改变,李涛认为是期望与失望之别:“正在接受教育的子女,因为子女还没有定型,家庭对教育还有更多的期许,因此他们必须要通过营造读书改变命运的氛围,给子女塑造积极的状态。而对已完成各阶段教育的子女来说,书本上所制造的知识与现实生活中所需要的知识相脱节,因此这样的农户家庭往往容易失望。”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如果能学以致用,解

决工作,甚至解决一家人的生计,读书就容易被认为是有用的。

在云南保山市龙陵县黄龙玉雕中等职业学校,记者见到了三年级学生郭跃龙。因为手艺出众,还没有毕业,学校已经给他开出了5000多元的月薪,让他一边学习,一边带学生。这个工资比学校已有18年工龄的副校长李新位还要高。

看着就业形势不错,郭跃龙把妹妹也送进了学校。像他这样,一个人上学,毕业后自己做玉石设计加工,家人开个店面销售,能解决一家子将来的生计,因此玉雕学校的学生流水似地,从来没有断过。“我们的学生好找工作得很,我们不愁生源!”李新位自豪地说。

## 打开学校的围墙

让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社区化、生活化,让学生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李涛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读书改变命运的功能还将继续弱化:

第一,“单位制”解体与“就业方式”改变,使缺乏社会关系网的农村读书人陷入就业困境,并影响村里人对读书效用的传统观念。取消分配后,农村家庭子女因为缺乏必要的社会关系网,同时也缺乏自谋职业所需的社会经验,很多人不得不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谋职或者失业回乡。由此,村落中口耳相传的读书人形象就被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形象取代。当村里人发现读书既找不到铁饭碗,也不能改变命运,那么他们就倾向于认为读书无用。

第二,不断开放的城乡人口流动政策抵消了传统中只有通过读书才能实现身份转换的功利性。过去只有读书升学才能离开村庄、留在城市,现在做生意、打工都有可能,何况读书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相对较高,农民的实用性则会“成本—收益”投资决策中从行为上强化“读书无用论”思维的形成。

但这并不意味着读书就真的无用。即便是在农村,读书也能够让孩子们拥有不一样的生活态度,掌握生产生活的能力。

杨东平说:“农村教育有三个不同的目标,

第一个是为升学服务,第二个是为进城打工服务,第三个为建设新农村服务,这就要求我们中学课程必须多样化。这个目标在高中阶段已经提出来了,但在初中课程还没有提出来,但是现在大量的农村学生,其最高学历就是初中。所以我觉得解决的方法应该是推进教育改革,让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社区化、生活化,让学生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杨东平不仅这样想,也这样做。2013年9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当地培田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向社会筹集资金,在福建连城县城培田村设立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实验小学——培田小学,杨东平本人担任学校顾问。

培田小学依托当地乡土资源开设了乡土课程,课程开发以多学科综合、生活教育为设计方向,将历史、民俗、建筑、生态等元素融入教材和实践活动。在拥有500多年历史的南山书院,每周五下午第三节课,来自培田村十番乐队的两名老艺人,一位负责二胡兴趣班的课程,一位传授笛子吹奏技艺,给学校三到五年级对乡土音乐感兴趣的孩子上课,村里的民间剪纸艺人曹凤英则不定期义务给学生上剪纸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还先后以志愿支教的方式,招募3位英语教师、一位美术教师,以及音乐教师、传统武术老师到培田小学任教。现在,学校内部已经生长出了自己的舞龙特色课,学校的体育老师组建了学生舞龙队,他们正在将培田村的一些民俗活动纳入这个特色课程的设计当中去。现在,家长愿意把孩子留在村里读书,学校已有80多名学生和50多个学前班孩子。

“升学不应该是农村孩子学习的唯一目的。”培田学校校长吴美照说,“我当年高考差5分没有考上大学,靠着高中文化基础从事了15年保护民居的工作,许多知识都是在实践中学的”。她希望农村学校不要再有围墙,而是发展个性,真正让农村孩子成为一方有用之才。



## 被嫌弃的教育

在农村,家里有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认为读书有用的多;一旦学生毕业,家庭就更倾向读书无用

虽然相隔千里,内批的反应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李涛的田野调查基本吻合。

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李涛在四川一个偏远行政村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田野研究。这个化名云乡雍村的地方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总户数273户,总人口1001人(其中男性519人、女性482人),人均年收入仅6856元。

经过调查,李涛发现读书无用论观念在雍村不占多数,但形势也并不乐观。在全村262户有效农户家庭样本中,106户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无用,占总体的40.46%;128户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有用,占总体的48.85%;认为无所谓的农户家庭有17户,占总体的6.49%;认为不知道的农户家庭有11户,占总体的4.2%。其中,雍村男性农民相对于女性农民而言,更认可读书无用,达到40%的认同度,而女性仅为25.8%。相反,认为读书有用的女性农民(67%)较之男性农民(44.9%)高了20多个百分点。

李涛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子女正在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有用的组内占比最高,一旦子女结束了教育阶段,家庭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可度就开始上升。

而且,这些子女已经从各级学校顺利毕业的农户家庭中,子女学历较高的家庭反而更认同读书无用论。比如,子女仅完成义务教育段学习的农户家庭有55.2%认为读书无用,子女已完成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同度占比就高达61.54%,认为读书无用的组内占比最高的是子女仅完成高中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达到了67.57%。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样本,是一个研究团队跟踪了25000名西部地区学生得到的调查结果。数据显示,这些学生中只有100个念到了初一,到初三时只剩69个,念到高三的只有37个。从中,我们或许能看到中国农村教育的一个基本面貌。“目前对读书无用论的讨论一直缺少全国的、系统的、科学的统计,我的调查不能说明全国的情况。但根据我的观察,农村的确存在认为读书无用的现象。”作为一个从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李涛对此十分忧虑。

来自教育部的数据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李涛的担忧并非多余。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



公元前686年的秋天,齐鲁边境的弹丸之地堂阜(今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一切静寂如常。时任齐国大夫的鲍叔牙,手心里捏着一把汗,正在这里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人,或者是一具冰冷无知的尸首。

这时,旷野里远远传来一阵激昂的歌声,鲍叔牙侧耳一听,唱的是一只志在千里的大雁被猎,仍然还向往着能够重归自由:“一朝破樊而出兮,吾不知其升衢而渐陆。”

除了那个人,还有谁写得出来这样的歌?眼前鲁国的队伍里,有一具囚车,上面坐着一个潦倒落魄的囚徒,而这个囚徒,极有可能是影响未来整个天下政治格局的人。

事实证明,鲍叔牙的眼光一向很准。这个人就是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他被孔子誉为“法家先驱”“圣人师”“华夏第一相”,甚至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家。

早先,他和鲍叔牙分侍齐僖公的两个儿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齐襄公驾崩后,小白成

# 管仲:逆袭天下的经济学家

□ 李咏瑾

功即位,即为齐桓公。在鲍叔牙的力荐下,齐桓公不但原谅了管仲的一箭之仇,还用计把他从鲁庄公的手中赚了出來,拜为丞相。

据说管仲的才干世间少有,他为政的国家必然会富强称霸。管仲为齐相后,其在经济方面的卓越表现,使人怀疑他根本就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家穿越回春秋时代。我们来看看他的几个足以载入商学院教材的经典案例:

衡山国夹在齐鲁之间,国民擅长制造一种很厉害的攻城机,堪称“春秋原子弹”,齐桓公想搞定他们又怕干不过人家,就让管仲想办法。管仲发现衡山国制造一台攻城机要一年半的时间,于是不计价格,以高价进口这种机器,还煞有介事地付了丰厚的定金。

燕国、秦国等老牌强国一看急了,齐国这是在扩充军备,争当世界老大的节奏啊。好,你买我也买,眼看订单滚滚而来,衡山国乐开了花,全民一窝蜂地开始制造攻城机,连衡山王自己都私掏腰包,暗地里进行了投资,上行下效,大家都去赚快钱,自然就没人去进行基

础农业建设。慢慢地,田园开始荒芜,可狂热的人们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对。

这时,管仲又悄悄派出了一支小分队,由外交交通大臣照朋领头,以3倍的市价在衡山国周边的国家收购粮食,5个月,随着大量的粮食被运到齐国囤积起来,粮食的市价被炒到了一个令人咋舌的地步。

眼看农时已过,齐国突然对外释放了“和平”的信号,宁肯将丰厚的定金赔给了衡山国,也要取消全部攻城机的订单。多米诺骨牌的效应马上产生,燕国、秦国也纷纷取消了订单。衡山国一看傻了,既没有赚到钱,又错过了今年的农时,结果发现粮食已经被炒到了天价。于是,衡山国爆发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不攻而破,成了齐国的附庸。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衡山之谋”。在管仲为政40年的历史中,他又用极为相似的手段,高价采购楚国的生鹿、代国的狐皮、鲁国的丝绸。甚至他和齐桓公联手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尊重当时已经衰弱的周

王室正统,表面看来是政治阴谋,其实也是通过周王的权威,重新制定天下的经济标准,来达到为齐国谋取丰厚经济利益的目的。

所谓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卖技术、四流企业做产品。管仲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善于玩弄权谋的政客,甚至也称不上是个善于征战的军事家(历史上他带兵和弱小的孤竹国打仗,动不动就被敌人困在了沙漠里,靠老马带路才脱困,这就是成语“老马识途”的由来),但他是一个卓越的经济学家或企业家,他的一切治国纲要无不带着气息浓烈的商业标签,他把整个齐国当成了一个巨无霸的托拉斯企业。

可以这样说,当时的齐国其实就是一家央企,被管仲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世界500强”之首;而管仲,就是这家央企最为出类拔萃的CEO。他带领着这家企业在周朝成功实现了上市套现,其商业气质和当时的封建社会乍然相撞,让整个天下的政客们都久久回不过神来。